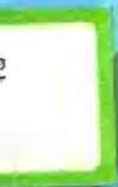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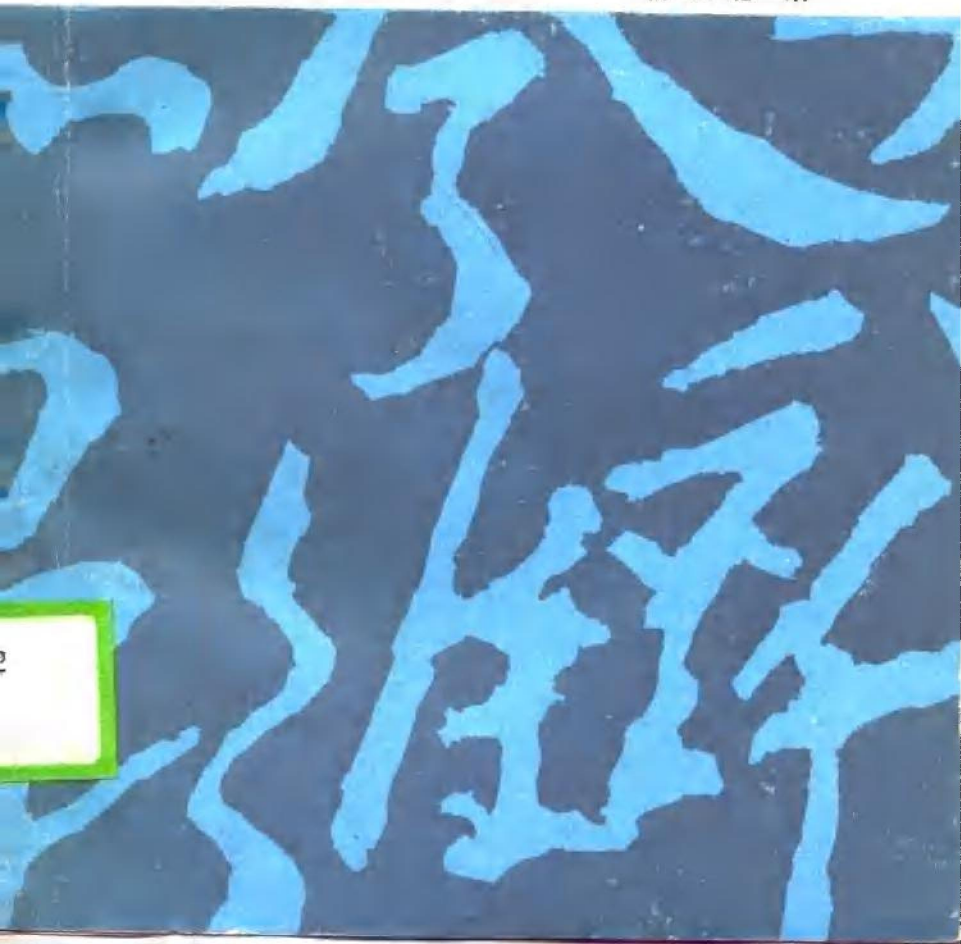


楊駱選集

楊西北 編



楊駱選集

楊西北 編

厦門大學出版社

杨 骚 选 集

杨 西 北 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0.625印张 239千字 插页7页

1989年12月 第1版 1989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615—0250—2/I·15

定价：4.30元



作者像（1939年元旦摄于安顺）

忆诗人杨骚

——《杨骚选集》代序

任 钧

〔前记〕《杨骚选集》快要付梓了。当编者杨西壮同志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异常兴奋和快慰！自从他在1957年不因幸病过早（只有五十七岁）去世以来，已将近三十年！

西北同志知道我跟他父亲三十年代曾在“左联”和“中国诗歌会”的壕堑里共同战斗过，是老战友、老诗友；因此，他要我为《选集》写个序言，我感到责无旁贷，愉快地答应了；但由于在1980年春，我曾写过一篇《忆诗人杨骚》一文（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其中，对杨骚的生活历程、文学活动及其诗作等等，都谈到了些，倘再写一篇序文，内容可能有所重复。于是，我向西北同志建议，是否可以将它用作“代序”。他赞同了我这个意见。

因此，倘若这篇“代序”在读者同志（主要是年青读者同志）阅读杨骚作品时，能够获得一些辅助，那我就深感满意了。

我一直这么想：从杨骚整个生涯和创作活动来看，他是个富于正义感的爱国诗人、作家。

在抗战前所写的《我与文学》一文中，杨骚曾谈到：由于小时候，在家乡（福建省漳州市）常常听到人谈及台湾被日本侵吞以后的惨状，并常常可以看到从台湾跑回到祖国的可怜的同胞，总觉得日本可恶，满清该死，“老想当个救国

英雄，把台湾讨回来，甚至想把日本全国灭亡了才痛快”；因此，当他初到日本留学时，曾决心学习海军，其后由于进海军学校有困难，又改变了念头，想学开矿，打算以开矿救国。可也没达到目的，这才为了获得官费待遇，考进高等师范学习，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由此可见：杨骚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在心灵深处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

离开日本后，他曾一度到南洋去教书，1927年由南洋回到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从此过着亭子间文士的生活。1930年春，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正式成立后，他很快就参加了。抗战期间的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后，他又在周总理的直接授意下前往南洋，参加在华侨社会中加强抗战宣传的活动和工作，直到全国解放。总之，在这漫长的十几年的岁月中，无论在参加“左联”工作时期，或是在抗战期间到南洋去的前后，也无论在他的工作和活动中，或是在他的作品里，都贯穿着一条极其明显的红线，那就是“抗日救亡”，也就是爱国主义的红线。自然，作为一个诗人、作家，这些主要是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其中，如《福建三唱》即是其例。这是一首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写于全面对日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光明》杂志的创刊号上。在诗中，诗人深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为当时给日本浪人、汉奸糟塌得一塌糊涂的国土而痛心、愤怒；最后是对乡亲们大声疾呼，要他们“点燃武夷山上的森林”，“烧毁汉奸的狼心狗肺”！要他们“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

由于这首诗的确异常真切而典型地体现了作为富于正义感的爱国诗人、作家杨骚的风貌；因此如今《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和《一二·九诗选》等等诗歌选

本，都把它作为杨骚的代表作之一选了进去，殊非偶然！

以上，就作为笔者对“代序”的一点补充意见吧。

1986、初冬、于上海

提到杨骚这个名字，对于凡是参加过三十年代文艺活动或是对它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决不会感到陌生，而且一定会知道，他是左联的诗人，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也是个文学翻译家；而对于一般年轻的读者们呢，则由于杨骚的著译如今已不易看到，特别是由于在十年浩劫当中，包括他的著译在内的三十年代文艺曾被林彪、“四人帮”任意加上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为“不可接触”的禁书；因而知道或听说过杨骚其人其书的，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

然而，我认为，除非你不谈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则已，不然的话，正如你不能不想到许许多多曾经为它的发生和发展贡献过自己一份力量的尚存或已故的作者们一样，你也不能不记起他，谈到他。

我跟杨骚相识和交往是在1932年当我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和活动之后。

杨骚原名杨维铨，1900年1月19日生。他的家乡是以出产水仙花闻名全国的福建漳州。他父亲是个做面条的工人。他出世一年后，就因为家境穷困，由他一个堂叔父把他抚养成长。1918年他在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为了获得官费待遇，考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他到南洋新加坡去教书，直到1927年才回到上海。

据杨骚自己后来在《我与文学》（见散文集《急就篇》）一文所述，他在留学日本期间，通过阅读作品，曾经接触过不少西洋作家。最初他顶喜欢的是俄国的安特列夫，后来又变成喜欢象英国的王尔德那些唯美派的作家，到了要离开日本

的前后，最高兴看的是德国霍普特曼的作品，尤其是他从自然主义转成象征主义以后的《沉钟》。这一切，在他早期作品当中，无论在主题、题材、表现形式方面，都曾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这是只要多少接触过它们的人都会感觉到的。

杨骚的为人，相当突出地表现出作为一个诗人的特点：热情、坦率、富于正义感，而且极其平易近人。当我在上海碰到他时，他已从南洋回国好几年，一直从事创作和翻译，出版过好几本著译，算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了，而在年龄方面也比我要大将近十岁；但他对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同志一直很关心，而且总是和蔼可亲，使人乐意跟他接近。

我们知道，在黑暗的旧中国，一个人要专门靠写作为生是并不那么容易的。一则当时稿酬和版税都很低，再则一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热衷于“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反动派动辄查封书店、禁止书刊出版，使得作家的生活毫无保障。一直依靠写作过活的杨骚自然也不会例外。加之，他的健康情况不好，一向为胃病所纠缠；因此，他当时的生活是颇为穷困的。

记得自从我们相识以后，他在上海都一直居住在租金比较便宜的、只有七八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一张小铁床，一张小写字台，一把旧靠背椅，一个藤书架，架上凌乱地摆着好些新旧的中文、日文、英文书籍，外加床底下一个旧皮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全部财产！不妨说，诗人杨骚正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亭子间文士”。

不过，由于当时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运动的形势很好，也由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杨骚在主观上一贯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尽管在物质生活方面较为艰苦，但也跟当时好些其他文艺工作者一

样，决不为它所压倒，所屈服；反之，却更加强烈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要求进步，并下定决心，要运用文学这一特殊武器去跟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因此，1930年春，当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左联宣告成立，他就毅然参加了。

我跟杨骚认识之后就开始有来往，而且很快就变得比较熟悉了。其所以如此，一则是由于当时彼此都是左联成员，在工作和活动中经常有联系；再则是由于彼此都爱好诗歌，具有共同的兴趣。等到1932年9月间一同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时，我们就更加接近了。

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除杨骚和我外，还有穆木天、蒲风等人。该会是由我们发起，并获得左联的同意后组织成立的；总会设在上海，后来还陆续在北平、广州、厦门、青岛等地成立分会。

鲁迅先生生前，对中国诗歌会的工作和活动也很关怀，我们陆续寄给他的该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他都看过，并多方给予精神和物质（捐款）方面的支持。1934年下半年，该会会员白曙同志等曾打算请他给大家讲一次“新诗歌的战斗任务”；但因考虑到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诚恐发生什么意外，终于没有这么做。后来只好由杜谈（即窦隐夫）同志负责写了封信给他，而他很快就写来了复信。这就是1934年11月1日鲁迅致窦隐夫的、谈到新诗写作问题的信（见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556页——编者注）。当时曾在《新诗歌》2卷4期上发表。在信里，鲁迅对新诗的写作提出过极其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不妨说，鲁迅先生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直到现在还可以当作新诗人的准绳。

当时杨骚和我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这一团体呢？简单地说来，就是：尽管那时候“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我们神圣的领土上旁若无人，横冲直撞；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意孤行，仍然顽固地执行他们那一贯对外不抵抗和对内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以致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民族陷进了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最严重关头！可是，也就在这种岌岌乎危哉的形势下面，在当时的诗坛上还有比较大影响的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人们却仍然无动于衷地从血淋淋的客观环境背过脸去，实行“在火山上跳舞”，大写特写其风花雪月或是无病呻吟式的唯美的、颓废的诗歌；实际上是在逃避现实，粉饰现实，乃至歪曲现实，完全违背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给读者带来很坏的影响。

左联成立以后，我们认为诗坛上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再也不能让它存在下去了；因而我们就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这一战斗集体，高举现实主义诗歌的鲜明旗帜，一面批判新月派、现代派及其他诗歌领域中的逆流，一面号召所有要求进步的诗歌工作者正视当前的现实，投身反帝、抗日、反压迫的斗争，写出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时代精神，为大众所喜爱的诗作。

作为发起人之一，杨骚在“中国诗歌会”成立前做了许多工作；正式成立后，又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当时该会时常召开有关诗歌理论问题的讨论会或学习会，杨骚很感兴趣，总是抽空出席，踊跃发言。

1933年初，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了，杨骚更是不辞辛劳地热心参加组稿、看稿以及编辑等工作，还经常给它写稿。

如前所述，杨骚在参加左联和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以

前，已经出版过好些著译，其中诗歌作品就有：诗集《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诗剧《心曲》、《迷维》、《记忆之都》等等。不过，由于受到诗人当时思想认识的局限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消极影响，尽管诗作也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光明未来的憧憬，但内容究竟跟客观现实距离较远，而且不时还流露出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因此，当我跟他相识以后，他总不愿意谈到他过去的诗作，偶然提及，也往往为之摇头、苦笑。关于这点，后来他甚至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过如下的话：“……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更加无意义，尽些些呀呀哟哟，恋爱故事和痰迷或发小牢骚之类，无足道者……”我认为，这些话，一方面固然表现了诗人可贵的谦虚品德；但另一方面是否也不妨把它们看成为他在对自己严格要求下的自我批评？

可是，实际上，在参加左联的前后，由于受到时代潮流的不断冲击，他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已开始踏上革命途程；因而他所写的诗，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如今且让我们举出他发表在《新诗歌》创刊号（1933年2月11日出版）的一首题为《小歌金陵》的诗为例吧：

明孝陵，	古百姓，
中山陵，	今百姓，
一样的伟大，	一样的渺小，
一样的惊人，	一样的可怜，
一样的成功，	一样的挖肉，
一样的革命！	一样的抽筋！

这是一首民谣风的短诗，写得很概括、精炼、生动。词句虽然很简单，内容却不简单；篇幅尽管很短小，意义却不小。

另外，杨骚还在1934年底写过一篇题为《乡曲》的长篇

叙事诗，1936年4月修改完毕，先刊登在1936年6月出版的《文学界》创刊号上；1937年7月又被编进“国防诗歌丛书”，出过单行本。

这篇叙事长诗共分五节，全诗约600行，描写了在天灾人祸的悲惨遭遇下，农民群众被逼得再也无路可走，只好采取直接行动——开仓分粮。结果，斗争虽然失败了，还遭受到惨重的牺牲，但农民群众也迅速地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这乌黑的天地不是我们的，……我们得打碎这乌黑的天地”！

长诗通过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剧烈斗争，如实地表现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中存在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并暗示出觉醒的农民群众，一定会继续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具有现实意义和积极性的主题，写作技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诗人杨骚当时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是很难能可贵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把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跟他早期所写的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无论在主题、题材和风格方面都显得多么不同；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在这一时期，杨骚在诗歌创作上已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在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前的一、二年间，杨骚除创作诗歌外，还在《光明》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过好些有关诗歌理论、批评的文章，如《从诗的特殊性谈起》、《感情的泛滥》等。由于他写作诗歌评论的文章时能够保持公正、严肃、诚恳的态度，对诗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公允的评价，所以，对当时诗人和广大读者都给与了不少的助益。

当“国防文学”这口号被周扬同志等提出之后，杨骚也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响应，很快就写出了《文学的国防动员》、《历史的呼声》等好几篇文章。其中还大力鼓吹，要诗人们多多写作“国防诗歌”，为抗日救亡作出应有的贡献。

献，对当时的文坛和诗坛发生了很好的影响。

以上这些文章，后来都被编进了1937年出版的散文集《急就篇》里面。

1937—1938年他从上海回到了福州。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当时也在该地的许钦文、楼适夷等同志组织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久，因该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无法开展工作，他只好离开福建，辗转到了四川重庆。

1939年，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曾到北方各战区访问，体验战斗生活。

杨骚到重庆后写了不少诗歌、剧本、论文、报告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曾在《抗战文艺》上发表。

杨骚到重庆后不久，我也由成都来到了所谓“陪都”，于是我们又有了经常碰头的机会。杨骚的情况还是跟抗战前在上海差不多：一个人生活、靠写文章过日子、胃病不时发作……

有一段时间他还曾经住在我的家里。

1941年初，皖南反共事变发生后不久，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党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曾经有计划地把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疏散到东南亚去加强抗战宣传工作，杨骚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他是搭乘飞机离开重庆的。由于考虑到当时相当紧张的政治气氛，他没有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他动身的具体日期，只是由我到珊瑚坝机场送他上飞机。那时，我想，我们不久定将重逢。那晓得匆匆一别，竟成永诀！及今思之，犹觉凄然！

杨骚到南洋后曾先后在新加坡、雅加达等地通过主编报纸、刊物以及教书等工作，在当地侨胞中广泛宣传拥护中国

共产党、团结、抗战；全国解放后，又在介绍社会主义祖国情况以及团结华侨等方面作出过贡献。

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新加坡文化界掀起了抗日保卫新（新加坡）、马（马来亚）运动，杨骚积极参加。新加坡沦陷前夕，以胡愈之同志为首的抗日文化界同志数十人，撤退到苏门答腊，杨骚也在其内。后来，他就跟给日寇杀害了的作家郁达夫开酒店作掩护一样，也借经营手工业作掩护，度过了一长串艰危岁月。

1952年9月，杨骚由南洋携眷回到解放后的祖国（杨骚到南洋后已结婚，并有了孩子）。回国后，曾任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当时我们常有通信联系。

1954年6月间，杨骚曾由广州到北京治病，离京返穗时，在上海勾留了好几天，并曾到我家去过，可惜我当时正好下厂体验生活，竟没有碰到，以致失去了最后一次聚首的机会。这真是个无法弥补的莫大遗憾呵！

1957年1月15日，杨骚不幸因患脑血管栓塞，病逝于广州广东中医实验医院，终年57岁。

57岁，依据解放后的标准，应该说还是早逝，倘使天假以年，诗人杨骚还可以为祖国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作一、二十年的工作，多写出好些优秀作品，乃至还赶得上为目前的“四化”贡献力量！可是，如今，这一巨大的损失，只好由我们这些后死者用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取得补偿了！……

1980年春于上海

目 录

忆诗人杨骚（代序）.....	任 钧（1）
----------------	--------

诗 歌

怀Piju.....	（1）
两个小孩.....	（3）
中夜雾.....	（5）
自杀未遂犯.....	（7）
流浪儿.....	（10）
诱惑.....	（12）
把梦拂开.....	（15）
错乱.....	（17）
夜的上海.....	（19）
黎明之前.....	（22）
黎明中.....	（24）
迷儿歌.....	（25）
永劫.....	（26）
粉蝶与红蔷.....	（28）
小兄弟的歌.....	（43）
小歌金陵.....	（47）
第三人称的悲剧.....	（48）
小麻雀的怀疑.....	（50）
福建三唱.....	（56）
悼高尔基.....	（61）
送行.....	（62）

摇篮歌·····	(64)
这是一首活的讽刺诗·····	(65)
二月四日·····	(67)
蜀道·····	(70)
赠红豆·····	(83)
夜半低吟·····	(84)
短歌一首·····	(86)
乡曲(长篇叙事诗)·····	(87)

剧 本

Yellow·····	(115)
记忆之都·····	(130)
蚊市·····	(150)
钉子·····	(181)

散文、杂文

十日糊记·····	(199)
关于文艺创作不振的感想·····	(223)
谢谢小瘪三·····	(228)
跑狗场·····	(238)
做人与做文章·····	(249)
我们的唁词·····	(254)
脸孔·····	(255)
续脸孔·····	(260)
我与文学·····	(263)
略谈作家的敏感性·····	(268)
批评家的手·····	(271)
普式庚给我们的教训·····	(278)